



古代文明研究

Researche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s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古代文明研究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5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张庆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文明研究 (第一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010-1816-2

I. 古… II. ①中…②中…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635 号

古代文明研究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19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816-2/K·961 定价: 138 元

目 录

试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	王 巍	1
中华古代文明与巫	吴汝祚	4
谈中华文明的早期演进	曲英杰	30
试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若干特点	陈恩林 孙晓春	40
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孕育	巩 文	50
豫陕晋相邻地区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张国硕	60
再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 ——兼论中原地区“王室文化”的形成	朱乃诚	70
从大汶口文化看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何德亮	80
东夷社会机制变革的考古学探索 ——以邳县大墩子遗址 M44 为契机	郭 物	98
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	郭大顺	115
夏商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变革关系分析 ——以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为例	王学荣	131
对中国文字起源的几点看法	刘一曼	147
关于冶金起源研究的思考	孙淑云	155
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梅建军	168
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	佟伟华	180
重提“文明”与“国家”的概念问题	彭邦炯	197
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若干问题	何 弩	20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英美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及其启示	徐良高	211

塞维斯的首邦学说及其相关文化演进理论	易建平 224
论走向多元化时代的中国考古学	水 涛 263
附录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名誉顾问李铁映发给“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贺信	269
附录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70
附录三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73
附录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75
附录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277
附录六 提交“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或论文提要目录	281
后 记	285
英文提要	287

Contents

<i>Wang Wei</i>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civilization” and “state”	1
<i>Wu Ruzuo</i>	
Wu magic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4
<i>Qu Yingjie</i>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30
<i>Chen Enlin and Sun Xiaochun</i>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40
<i>Gong Wen</i>	
“Civilization elements” archaeologically recognizable in the Yangshao culture	50
<i>Zhang Guoshuo</i>	
Conjunctive area of the Henan, Shaanxi and Shanxi and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60
<i>Zhu Naicheng</i>	
Re – discussion on the Taosi dragon design imported from the Liangzhu culture; formation of the “royal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70
<i>He Deliang</i>	
Dawenkou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80
<i>Guo Wu</i>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social mechanism in the Dongyi societies; implication of the burial M44 at the Dadunzi site in Pixian	98
<i>Guo Dashun</i>	
Niuheliang site and the social reform in the Hongshan societies	115
<i>Wang Xuerong</i>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 – Shang replacement and the chang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formation from the Erlitou and the Yanshi Shang city	131
<i>Liu Yiman</i>	

Several ideas on the origin of writing system in China	147
<i>Sun Shuyun</i>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metallurgy in China	155
<i>Mei Jianjun</i>	
Origin of metallurgy and early copper objects in China	168
<i>Tong Weihua</i>	
Development of walled city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rom prehistoric China to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180
<i>Peng Bangjiong</i>	
Re - discussion on “civilization” and “state”	197
<i>He Nu</i>	
Theories and methods pertain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202
<i>Xu Lianggao</i>	
“There are other hills whose stones are good for working jade”: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west	211
<i>Yi Jianping</i>	
Service’s chiefdom concept and related cultural evolution theories	224
<i>Shui Tao</i>	
Chinese archaeology towards a poly - elements era	263
Appendix 1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Li Tieying,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norary consultant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CASS	269
Appendix 2 Lecture of Li Xueqin,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CASS	270
Appendix 3 Lecture of Zhang Wenbi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73
Appendix 4 Lecture of Huang Haotao,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Bureau, CASS	275
Appendix 5 Lecture of Liu Qingz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ivilizations, CAS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277
Appendix 6 List of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81
Postscript	285
English abstract	287

试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中，“文明”的含义，“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许多学者依据这一表述，将“国家”等同于“文明”。也有人认为二者并非完全相同，亦非完全同步。“文明”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搞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 关于“文明”的含义

关于文明，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我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是在国家的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的发明与创造，也包括社会的进步。我们常谈到的商文明、周文明，都应是这样的概念。它包括商代和周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明创造与进步，而并非仅仅是指商、周时期的国家政体。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将文明完全视同于国家，则既不利于对文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也不利于对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做多角度、多侧面的考察。

把文明等同于国家的学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恩格斯的名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根据我的理解，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指国家的形成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的特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了文明社会，最主要的就是要看其是否已出现了国家。因为国家的出现是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质变点。它导致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概括并不等于全部，并不是说国家就完全等同于文明、国家就是文明的代名词。

二 文明的构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我认为，文明与国家是不同范畴的概念，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而言的（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原始社会是真正意义的蒙昧和野蛮），是依据人们掌握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知识、技能的情况与精神生活的丰富状况、人类社会的管理与秩序强化的程度不同而区分的。国家则是与氏族、部落、酋邦等社会组织相对应的概念，是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被强化的公共权力，主要是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

我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文化层面的文明和社会层面的文明两个方面。

1. 文化层面的文明

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

1. 物质文化

(1) 农业的发展（包括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及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2) 手工业技术的进步（通常以冶金术的出现为代表，在中国，还包括琢玉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髹漆技术的进步等）。

2. 精神文化

(1) 文字的使用；

(2) 原始宗教的发展和与之相关的祭祀礼仪被高度重视；

(3) 伦理道德的规范，也就是文明教化。

2. 社会层面的文明

社会的复杂化达到新的阶段——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等级制度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长的权力被世袭化，神权与军权相结合构成王权，同时出现了作为王权统治工具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形成。此时即进入了文明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的两个方面，即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的产生是相辅相成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侧面。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如1) 支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加；2) 用于再分配和流通贸易的贵重品、珍稀物品（如铜器、玉器、海贝、龟甲等）的生产。后者则为前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管理、协调和组织，并提出进一步的需求，从而促使前者进一步发展。它包括劳动力的组织、分工与合作；人们相互关系的调节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如宗法制度和礼制；对贵重物品、珍稀品的持续的需求推动了这类用品的生产和供给。

三 研究文明应当兼顾文化与社会 组织结构的发展两个方面

既然文明是由文化和社会两个层面构成的，那么，研究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也需要对文明的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是要研究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前者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后者则是文字的产生、原始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等。二是研究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包括阶级的出现、等级制度的强化、权力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发展等等。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对文明的社会层面的研究，而忽视文明的文化层面的研究。通过对文明的文化层面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文明（物质的和精神的）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了解文明形成过程中文化发展的过程、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即文化内部的发展和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并可以此为线索，分析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区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以及各地的文化及其创造者们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使文明起源的研究富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视角，使我们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大赞成将国家起源研究完全等同于文明起源研究。我认为，国家起源的研究是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或基本的内容，但是，它不是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部，它不能完全替代文明起源研究。

总而言之，文明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之中起源和发展起来的。考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需要将其放在当时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中去考虑，需要多侧面、多层次的分析。不仅要分析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追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和原因机制，还要从文化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各地区文化之间碰撞交融的过程和意义等方面来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与社会两方面去考虑，比仅从社会一个方面去思考要全面。当然笔者丝毫无意否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对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只是认为，在进行文明起源研究的时候，不应忽略对文明的文化发展方面的考察，即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展变化的考察。

中华古代文明与巫

吴汝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巫术，是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关于它的产生，有的学者认为：“大概是出现在原始社会氏族社会阶段，当人们对人本身以及人以外的自然还处于蒙昧状态时，便容易产生出人与自然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的错误观念。幻想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达到影响自然以及他人的目的，便产生了巫术”^①。中国原始社会时期有关巫术的考古资料，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较少。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资料，有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河北徐水县南庄头和阳原县于家沟遗存等。到距今约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彭头山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期^②，则是发现了许多有关巫术活动的用器与迹象，如彩陶、白陶、龟甲上的刻符等。据此分析，这一时期绝不是巫术的初创时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大溪文化、红山文化等时期，发现的巫术用器和遗迹就更多了，尤其是出现了占卜术。经龙山文化时期（铜石并用时期）的发展，占卜术对其后夏、商、周三代的巫术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于彩陶的产生，有的学者通过对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较多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器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此遗址出土的“彩陶主要是自然崇拜的产物，为巫术活动而形之于艺术的表现，换句话说，彩陶原始产生的契机，主要是基于宗教意识”^③。可见彩陶器的产生与巫术活动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

一 农业生产与巫术的关系

农业的出现，主要表现在对禾本科植物的栽培。它改变了原先完全依赖大自然的采集和狩猎经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新起点。农业生产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天时与地利，又影响着这一优越性的发挥，有时甚至可能使这一优越性降到零

点，即颗粒无收。人们要满足获得丰收的愿望，却又由于一些当时还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由恐惧进而发展为崇拜。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平衡。换言之，巫术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丰收的愿望，增强战胜自然力的精神支柱，所以它的本质是“事神以致福”。

中国史前时期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巫术活动，以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在距今 5500 年左右的河南汝州市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就已存在。如该遗址 104 号瓮棺缸的腹部磨光，一侧用白彩绘一长方形作底，上有人手形纹。这是在手部涂上棕色后，稍加用力拍出来的，每个手指的彩色都向内凹，两手指之间仍保持白彩底色。缸的另一侧也以白彩作底，用棕色绘出一个略呈长椭圆形的物体，其后侧有柄，两者之间有一竖道。这一图案被认为与古代木耜的形象相似^④。若把这幅像耜的图案竖直起来看，耜身与耜柄之间的竖道就成为横道。将这横道与民族学资料对照分析，就可以发现它应当是一根短木棍或长条形短木板，其作用是在翻土时，用人脚踩在横棍上用力蹬，以增加耜的入土深度，同时也可省力。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中，有一种以涡纹、弧线、直线、圆点等组成的几何形图案颇引人注目。这种图案绝不是随意虚构的，必是反映了一定的事物。20 世纪 60 年代苏秉琦先生在《关于仰韶文化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图案应当是蔷薇科和菊科植物的花朵^⑤。但庙底沟类型的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两种植物的花朵作为彩陶图案呢？笔者认为蔷薇科植物的开花季节是在春天，因此，此图案可预告人们可以春耕了；而菊科植物的开花季节是在秋天，所以它又预告人们应该准备秋收了。可见这种彩陶器具应是春耕、秋收时举行巫术活动的一种用器。

洪山庙仰韶文化遗址的 91 号瓮棺缸上绘有日月纹图案。缸的上部残缺，但日月纹图案基本上可以辨明。缸的腹部磨光，腹中部的相对两侧绘有太阳和月亮的图形。太阳纹以白彩为底，中间用鲜艳的红彩画出一轮红日，直径约 12 厘米。在红日外缘约 4 厘米处，用黑彩画一个大圆圈；与太阳纹相对应的另一面，则画有一个新月形的月亮形纹，中间填白彩，周围镶黑彩边线，内侧边线较细，外侧边线较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残彩陶钵上，以白衣为底，用黑彩勾划出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纹，有的学者根据钵口沿的弧度和每个太阳纹的夹角计算出全器共有 12 个太阳纹。此外，鼓腹钵残片的表面有白衣，上用棕、红等彩色画出一个个太阳纹。用上述方法计算，则原有的太阳纹也是 12 个。根据这两件陶钵上均绘有 12 个太阳纹的情况，我们认为，它“可能反映出一定的天象和历法观念，如表示一年有 12 个月”^⑥。河北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敛口钵（H20：2）残片上，左右各有一个太阳纹，居左的太阳纹置于三角涡纹的上方，光芒向上发射，似旭日东升；居右的太阳纹置于三角涡纹的下方，光芒向下放射，似日落西山的景象。在这两个太阳纹的外侧有多条斜行曲线纹，与三角涡纹相结合，似为一片丘陵地或山谷。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鸟纹彩陶中，有一只鸟的背部上方有一个大

圆点，圆点上有一条弧线。此圆点应是象征太阳，它与“金乌负日”的神话是相吻合的。而圆点上方的弧线，与纳西族东巴文中“天”字的写法有相似之处，应是象征天。天与鸟之间就是太阳，这至少反映了泉护村人有关天象的一种理念。当然，此鸟不是一般的鸟，而是神鸟。另一种彩陶鸟纹是仅在鸟的背部上方有一条弧线，这应是太阳神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其中马厂类型彩陶所反映的太阳神崇拜较为明显。除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外，还有以圆圈内加“十”字形纹象征太阳的情况，而且相当普遍。如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遗址墓葬中发现的7500多件彩陶器中，以圆圈为单元的纹饰有414种^①；圆圈内加各种不同形式“十”字纹的纹饰有230多种，约占圆圈为单元纹饰的近五分之三。这种“十”字形纹还用于饰有舞蹈纹的舞蹈者的面具上，如柳湾555:16彩陶瓮上的舞蹈纹即为一例。

此外，太阳纹和象征太阳的“十”字形纹彩陶，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北阴阳营遗址和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等都有发现。在此不一一列举了。需要提出来的是在湖南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发现的一件白陶盘的底部戳印一个八角形纹，在其中心方框内还戳印一个略呈旋转状的“十”字形纹。此八角形呈光芒四射状，以象征太阳。这种纹饰在其后的大汶口、野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内蒙古敖汉旗南台地小河沿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此外，崧泽文化崧泽遗址的陶器上也有刻划的八角形纹。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编号1~4的玉版上，也雕琢有八角形纹。这种八角形纹，有彩绘的，有刻划的，可能与当时人们的习俗有关。

在刻划纹陶器中用作巫术活动的用器有，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第4文化层出土的稻穗纹、猪纹陶盆（T22④:232）和刻划有猪纹的方钵（T243④:235）。猪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家畜，有这种纹饰的陶器在河姆渡遗址中仅各发现一件，数量甚少。其造型也与常见的日用陶器有别，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器，很可能是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皿。此外，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陶盆残件（T29④:46），上有一组刻划纹图案，图案的中间部位有似无弦的弓形，其下左右有两个同心圆纹，它的两侧又各有动物形纹。这无弦的弓形，是纳西族东巴文对“天”字的另一种写法，当是象征天。天下面的两个同心圆代表的是眼睛。在史前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太阳是宇宙的眼睛。这座遗址的骨牙器上也有刻划的太阳形纹。如一件有柄骨匕的残柄正面刻有二组相类似的图案，每组图案以同心圆为中心，其上部有一个无弦弓形，在这两者之间有短斜线，两侧有头相背的双鸟托住同心圆和无弦弓形图案。这两组图案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的解释是，同心圆象征的是太阳，无弦弓形即上述天的象征，太阳纹外侧的短斜线表示太阳的光芒，而双鸟托着的当是太阳了。与此相似的还有双鸟朝阳的象牙雕刻器（T226③:79）。此器正面磨光，有一组阴线雕刻的图案。图案以大小相套的同心圆为中心，外缘刻有熊

熊烈火似的光芒，在其两侧有昂首相望的双鸟托住同心圆纹。这组图案的意义应与上述骨匕柄部的图案相似，均为双鸟托着太阳。这种鸟当不是一般的鸟，而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鸟，它与中国古代“金乌负日”的神话有着密切联系。

有的学者对河姆渡遗址第4文化层出土的陶塑猪（T21④:24）和方钵上刻划的猪纹（T243④:235）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猪所具有的巫术意义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水畜、灵畜、知雨畜→祈雨巫术→财富、地位之象征（……贪虐之象征……）→大众化之祭祀牺牲”。并认为“在采猎时期，猪为水畜、灵畜、知雨畜的观念已经形成，并已为人们所认识利用。发展到原始农业早中期，这种认识更被广泛用于直接关系稻作丰荒的祈雨祭祀中”。河姆渡遗址所出陶器上的猪刻纹和陶塑猪形象，多为野猪。野猪在知雨这一点上会比家猪更灵敏。上述稻穗纹和猪纹陶盆（T22④:232），正说明“这种巫术的最终目的是祈雨，使水稻丰收”^⑧。此外，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出土的猪首形匜（M52:2）、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猪形鬲（M111:3）、江苏高邮县龙虬庄遗址出土的9件猪形陶壶等，与河姆渡人以猪祈雨、祈望农业丰收的巫术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陶罐，说明这里可能是原始祭祀活动的遗存。在2号窖穴的小坑中发现有盖的小陶罐。这几个陶罐的出土地点很相近，可能是祭祀的地方。半坡人“把粟粒埋在地下，大概是奉献‘粟米之神’以求更多的收获”^⑨。有的学者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研究后认为，此地进行的当是藏种巫术^⑩。

从民族学的资料分析，还处于原始农业时期的人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进行一系列的巫术活动，以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以上所列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考古资料，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下仅以部分资料进行分析阐述。

洪山庙104号瓮棺缸上的人手形和耜形彩陶图案。耜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种耒耜工具可以用来翻松土壤，改变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增加其肥力，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史前时期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见到经耜翻耕过的土地种植的农作物明显优于未经耜翻耕土地种植的农作物，但却难以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到翻松土地对农业生产所起作用的原因，因此就不得不归之于耜的神力。而要耜发挥翻土作用，必需有人力使用它，于是在耜相对应的一侧，用人手拍上一个手印，以示用手握耜进行翻土。显然，这也是一种祈求农业生产能获丰收的巫术用器。

上述考古资料中，对太阳神崇拜的实例较多，这与史前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有关。太阳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没有太阳，人们在黑暗中就难以生存，动植物也无法生存繁殖。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在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倘使遇到久晴不雨，炎热

的太阳会把农作物晒得枯萎，从而影响到庄稼的收成，甚至颗粒不收。遇到这样的天气，史前时期的人们就会对太阳产生畏惧心理。因此，人们对太阳就产生了崇拜和畏惧的双重心理。为了在心理上求得平衡，于是就有了太阳也存在善、恶的说法。恶的太阳正如东汉王充《论衡·言毒篇》中所说：“夫毒，太阳之热气也。……太阳火气常为热螫，气热也。”又说：“鬼者，太阳之妖也。”“人见鬼者言其色赤，太阳妖气，自如其色也。”史前人们认为这种恶毒的太阳是妖鬼、妖气，因此就出现了《淮南子·本经训》中所说的巫术活动，“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注》曰：“十日并出，羿射去九。”而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件残彩陶钵上均绘有 12 个太阳。可惜彩陶钵残缺较多。若计算无误，则很可能在大河村仰韶文化人们的心目中有 12 个太阳的神话。当然这些太阳也有善恶之分。

在洪山庙仰韶文化 91 号瓮棺缸上的日月形彩陶纹饰中，太阳被画成一轮旭日，而月亮则被画成一个月牙形。两者对比，有着明显的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原始宗教的天体崇拜中，对月亮的崇拜，在世界各国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我国，古代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月亮的神话，而关于古代人们如何将月亮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资料并不丰富”^①。《书·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六宗”有“天宗”，即日、月、星三宗；“地宗”，即河、海、岱三宗。月神是“六宗”中的一宗，是人们崇拜的自然神之一。《礼记·祭义》中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注》：“坛之形则圆而无所亏，以象日之无所亏而盈也；坎之形则虚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坛高而显，坎深而隐，一显一隐，所以别阴阳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阴阳之上下。”在祭天神的规格上，日神高于月神，日神为主，月神仅是一个配角。

《书·舜典》和《礼记·祭义》记载的日月神崇拜，在时间上可能要晚一些，但推其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仰韶文化时期。

在上述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太阳神崇拜相当盛行，而在其前的马家窑类型时期，对太阳神的崇拜现象却仅有少量发现，其后半山类型时期的有关资料也仅比前者略有增多。为何到马厂时期对太阳神的崇拜现象会突然大为增多呢？笔者认为这种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增多的现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天时有很大关系，所谓“靠天吃饭”就是这个缘故。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地区，这里雨量少，气候干旱，为求得农业的丰收，求神祈福的巫术活动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而然地就盛行起来。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点。

史前时期人们的太阳神崇拜，由神秘性、神灵性，到距今七八千年的城背溪文化晚

期时，开始演变为人格化。如“秭归东门头遗址新发现的太阳人石刻，丰富了城背溪文化的内涵^⑩。对此古代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由神秘化发展到人格化是一个大转变。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大转变呢？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已发展到以农业生产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时期。城背溪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正处于由刀耕火种向耜耕农业转化的时期。随着耜耕农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与认识领域的扩大，人们愈来愈感觉到太阳与其日常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而有了进一步探究太阳神形象的欲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人的形象，把某些部位加以神化，塑造出似人非人的形态。这对其后神的世俗化有直接影响。

在这里还需要提出探讨的是仰韶文化晚期为什么会产生占卜的巫术活动呢？这在中国古代巫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大的转变，并对其后社会的发展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探讨。

目前发现的卜骨，以仰韶文化晚期的为最早，距今约 5000 年。如在河南淅川县下王岗仰韶文化第三期遗址内发现 1 件卜骨（T14⑤：102），此件卜骨为羊肩胛骨，上有灼痕。在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也有学者称此类型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一座半地穴式房址内，也发现 5 件卜骨，均为羊、猪、牛的肩胛骨。骨面上留有灼痕和阴刻符号。阴刻符号有“=”、“-”和类似“S”形的图案。在内蒙古赤峰市富河沟门遗址还发现一件用鹿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其上有多处灼痕。这一时期卜骨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当有其时代背景。

综观仰韶文化晚期时，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郑州西山出现了仰韶文化城址，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也有大型仰韶文化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房基址（F901）。这座房址规模宏大，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结构严谨，由主室、侧室、后室和房前附属建筑组成，占地面积为 700 多平方米。在它的南面约 240 米处，有一座规模稍小的大型建筑 F405。它们的周围还暴露有其他大型建筑遗迹。这些建筑物共同组成了礼仪性建筑群体^⑪。

城址和礼仪性大型建筑群体的出现，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复杂起来，以往的巫术活动仅是有事需要求神时，由巫师以歌舞迎神来临，神被迎来后，还要用最好的食器盛放鲜美的食物来祭祀神，并由巫师作法以求得神意，巫师也因此成为人神之间的代言人，然后，再以歌舞送神。这样的巫术活动，已不适应开始复杂起来的精神生活，需要有符号或文字（当时不可能就有文字）来帮助记忆或将其记录下来。因此原来的巫术就要有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卜骨就应运而生了。

为什么当时的人们用兽骨而不用其他物品作为占卜材料呢？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生

活有关。对此，已有学者作了分析阐述。

“关于骨卜的起源，无古籍记载可考据，但可以作如下推想。有一次人们在烧烤带骨的兽肉时，骨头的炸裂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后进行的战斗获得了大胜，或狩猎丰收。于是烧烤兽肉时，兽骨的炸裂便成了吉祥征兆。兽骨的炸裂是无意中造成的。后来人们就把它用于占卜，以兽骨是否会炸裂作为吉兆或凶兆。后来或许发生了这样的事：兽骨炸裂的吉兆并不灵验，而人们在寻找不灵验的原因时，注意到了裂纹的大小、横直、长短等情况。于是在无数次重复过程中，人们便整理出了一套关于烧烤兽骨炸裂痕迹的占卜信条。到了这个时候，在偶然中产生的烧烤兽骨的原始前兆迷信，就发展成为有问题就随时可以进行的一种占卜了”^④。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 5000 多年前，人们就已有烧烤兽骨的情况，如在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有烧烤现象的 530 件兽骨中，距今 6000 多年前的第一期兽骨有 470 件，其中以家猪和梅花鹿的骨骼最多^⑤。这些兽骨在烧烤时也会发生炸裂，但当时还没有利用它的条件和要求。不过，因骨质的不同，对带骨兽肉进行烧烤时发生的炸裂声有大、有小。年复一年，当人们意识到了这些现象却又无法解释时，就将其归之于神。于是，就出现了卜骨。

二 巫是观测天象掌握天文知识者

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太阳神崇拜，从天文知识的角度来说，是当时的人们对太阳的一种认识。令人惊奇的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认识到在太阳和月亮与人们的关系上，是以太阳为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史前时期的人们神化并加以崇拜月亮的资料并不丰富。这一方面不再赘述。

史前时期，人们对太阳的认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最为明显的是对墓葬方向的定位。如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也有学者称它为贾湖文化）遗址，共发现墓葬 349 座。墓向以西为主，次为西南向，少数为西北向，其中介于 $266^{\circ}\sim 275^{\circ}$ 之间、基本上呈正西向的墓有 184 座，占墓葬总数的 52.7%；另有正好是 270° 的墓 111 座，占墓葬总数的 31.8%；墓向在 $241^{\circ}\sim 265^{\circ}$ 之间的墓有 104 座，占墓葬总数的 29.8%，主要集中在 255° 以上；度数越低，数量越少，墓向在 240° 以下的墓只有 5 座，仅占墓葬总数的 1.4%；墓向在 $276^{\circ}\sim 299^{\circ}$ 的墓有 34 座，占墓葬总数的 9.7%，其中又多在 280° 以下；度数越高，数量越少，超过 300° 的只有 3 座墓，仅占墓葬总数的 0.9%；还有方向不明的二次迁葬墓 19 座。可见贾湖人的墓向，不见东、南、北三个方向^⑥。

又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墓地共发现成人墓葬 174 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有 118 座。墓主人的头向绝大部分是向西，有一部分向西北或西南斜置，一般说来与正西方向相差不超过 20° ^⑦。